

文艺学前沿丛书

主编：王岳川 欧阳友权

心灵化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

白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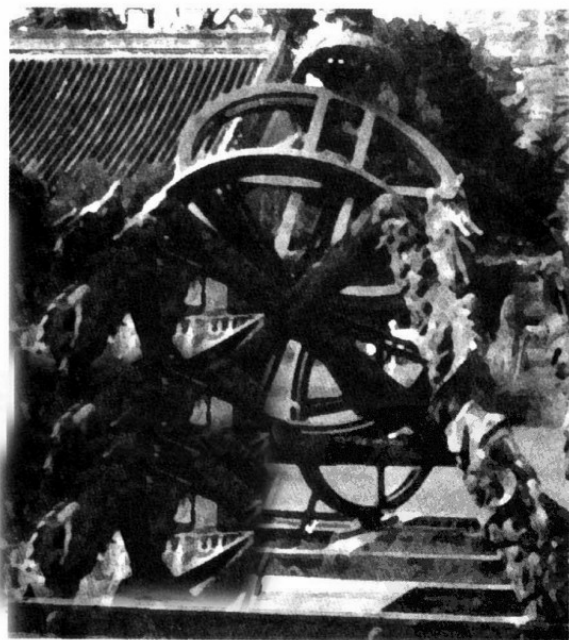
文艺学前沿丛书

主编：王岳川 欧阳友权

心灵化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

白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白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

(文艺学前沿丛书)

ISBN 7-5004-5277-2

I. 心… II. 白…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806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292 千字

定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原 言 一

王 岳 川

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 and 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本土化和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文化对话论”既不是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是坚持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从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主义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种族变革紧密相关。多元

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人类的生成是同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对象化紧密相关，“人类文化”其实是文明发展中不断升华生成的“文化人类”。人类经历了手写文明时期、印刷文明时期和无纸工业文明时期。这三个文明时期呈现出人类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也是人各种素质的伸张史。但在转基因时代，人的精神生命不断发生变异，文明载体与人的精神生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如何在新世纪网络人、股票人、投机人、经纪人充斥世界之时，在图文时代虚拟的全球化时代，以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似乎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得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

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自足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

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话语空间。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化阐释问题，而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和呈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形象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前提。

中国形象的重新书写当会整合华夏文化精神，展示文化哲人群体精神人格风貌。历史和文化的真正价值，集中体现在那些伟大而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思想家身上。他们以创造思想更新观念为己任，关注苦难的人类命运和未来前景，在精神人格和独立思想中从事历史文化精神的遗产的新阐释。然而，真正的思想者又是孤独的，社会文化或知识增长往往是靠少数真正独立不倚的思想者的坚韧推进，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思想成果的同时，又使思想的革命性消解成习惯的残余物，或以世俗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如何透过文化历史的幔帐，去寻绎民族精神的时代更迭演变的“思想型”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论域中，以生命体验穿过每个思想者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硬壳，对其前提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质疑，从中追踪中国文化学术增长中那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身”。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套由中南大学文学院策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前沿丛书》，旨在分批出版当代学人的有研究深度的著作，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思维向度，使中国文艺学在译介西方文论之后，能够有效地开始自身文论话语的重建，并不断地获得中国文论身份和文化创新意识。

2005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

序言二

我们去哪里触摸前沿？

欧阳友权

这套“文艺学前沿丛书”是我所主持的教育部“985 行动计划”立项课题的成果之一。我们学院的“文艺学”是重点建设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2003 年我挑头申报的“面向 21 世纪文艺学前沿问题创新研究”被批准列入“985 行动计划”建设项目。2004 年我们组织撰写出版的“网络文学教授论丛”（1 套 5 本）和这套丛书，都是该立项建设的子项目成果，也是我们这个学科团队成员的集体亮相。学科梯队中还有几位教授和博士的相关成果，将会在今后陆续展示给学界同仁。需要说明的是，王岳川先生是我校特聘的讲座教授，他每年都来我院为研究生授课，并在这里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次他拿出自己的厚重之作《艺术本体论》加盟这套丛书，并且和我共同主编这套书，这不仅为这套丛书添彩，也是对我们学科建设的一种支持！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永远都会有前沿话题和研究这些话题的前沿成果，文艺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这些永远“在路上”的研究者的职责，就是设法走进前沿，敢于触摸前沿，勇于探索前沿，并希图对前沿研究有所推进。问题在于：我们去哪里触摸文艺学的前沿？

事实上，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更新和裂变中的当代文艺学不是没有前沿，而是前沿太多，且动荡游移，边界模糊，让人捉

摸不定。譬如，就学科内部来说，技术化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正面临重新洗牌的“涅槃性调适”：（1）艺术精神作为“审美逻各斯”的乌托邦救世神话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被解构主义釜底抽薪，而且被物质主义的欲望现实击得粉碎，文艺女神不得不降尊纡贵，走下神坛；（2）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强势挤兑造成精英与大众合流趋势加剧，它在消除“文学经典”头顶那神圣的光环的同时，也抹平了高雅/通俗、精英/大众、传统/现代、形而上/形而下、灵魂/肉身等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乃至出现“价值非意识形态化”的艺术“渎圣”理念；（3）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导致“艺术与非艺术”边界模糊，艺术的“自律性”神话隐退，文学的“文学性”被挑去了神秘的面纱，艺术不再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而成了人们身边消愁解闷、随时把玩的“琥珀扇坠”；（4）由于被不断建构的社会文化语境不时改写“文学”的定义，拆卸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使得原有的文学艺术场域露出巨大的豁口，文艺学研究似乎已不限于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是在面对一个无边无涯的“文化超市”，这样的“学科越界”带来的不仅是学科泛化和学术聚焦失依，还可能淡化文艺学研究的人文底色，使文学艺术丧失批判现实的超越性距离。

再从文艺学科的外部环境来看，发展中的文艺学正面临新的历史语境。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人文操守和社会角色定位，还是消费社会的价值转型；不管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问题的论争，还是科技与人文的观念博弈与思想对话，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乃至拉动文艺学的学科转型，并不断把下面这些问题推向学术前沿：（1）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的凌厉挤压和点滴渗透，引发的不仅有“文学失语症”的喟叹、“文化殖民”的隐忧和呼唤“文化对话”的诉求，更深层的动因还在于为我们的文化

(含文艺学)的“民族持守”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2)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撒播,带来的有文化纳受或拒斥的心态对立,有后现代对中国当下文化症候的阐释困境,还有“后学”研究本身的文化思想交锋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在传统价值观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后,如何重建新的价值立场,以便在阐释世界和确证意义时,对文艺学知识体系的更替和学术思想的创新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学科延伸的契机,已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文艺学无以回避的新命题;(3)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电子媒体催生的图像文化转型,使得艺术的技术性成了技术艺术化的一种注脚,由此带来的文艺存在方式、创作模式、功能范式和传播与欣赏方式的改变,其所改变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形态和惯例,还有“何为艺术”与“艺术何为”的逻各斯原点命意。面对数字化媒介的强劲挑战,文艺学该如何担当起自己阐释抑或引导文艺现状的使命?(4)还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价值杠杆功能所容纳的跨国资本的文化延伸,正在把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纳入文化产业的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运作模式中去,文化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旋即把文艺拉进消费体系普世化机器运转起来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都将成为商品生产的内在环节和战略机制,而当艺术产品不得不面向市场磨砺自己的生存智慧时,它能否仍旧成为人类希冀的精神家园而保持原有的那份“诗意栖居”的净朗与澄明?……

看来,只要是真诚地走进文艺学场域,你便会发现这里处处是前沿,自己则时时被裹在理论漩涡的中心。我们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脚下发掘理论资源来触摸这前沿的脉动,从而把“哪里才是文艺学前沿”的问题变成“如何推进文艺学前沿问题创新研究”,这样的建设性立场也许才会对建构面向未来的文艺学形态有所裨益。

这也就是我们主编这套“文艺学前沿丛书”的原初动因。

读者会发现，在这套书中，王岳川先生的《艺术本体论》是站在学术前沿思辨艺术本体这个“元命题”，其切中肯綮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是对这一文艺学逻辑原点的开掘与推进。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讨论以“第四媒体”为标志的数字化技术背景下的文艺语境转换和艺术谱系学转型问题，其所着墨的数字化艺术个案——网络文学的学理解读，实际是在考辨数字艺术的人文逻辑和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问题。蓝爱国的《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和白寅的《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正好呈一横一纵的学术态势探讨文学批评问题，前者在一个全球化的现实时空中，共时态地追问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生态、身份表征、价值迁徙、美学向度和主体的阐释焦虑问题，后者则从民族文论传统的历史反思中，历时态地清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征——心灵化批评范式，廓清这一思维特征的缘起、流变、结构形态和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其在文学转型中的发展前景等。柏定国是我们学院的博士生，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中的“开门弟子”，他的这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论》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课题的成果之一，其所探讨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的问题，既有对“史”的实察和真诚，又有“论”的锐利与深邃，在这套丛书中部头最厚，分量不轻。

这套丛书的选题及其个人化展开，究竟是否触摸到了文艺学前沿，甚或积极推进了学术前沿的有效延伸，最终可能并不在于作者的初衷，也不会取决于主编的表白，而只能由睿智的读者来评说。

2005年2月16日于中南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序言一	王岳川 (1)
序言二	欧阳友权 (5)
绪论	(1)
第一章 心灵化批评形成的渊源	(22)
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发生学渊源	(22)
一 原始思维的泛联系性	(22)
二 中国初民的语言文字对中国传统思维 方式的凝定	(33)
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社会学渊源	(42)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审美的而不是对立的观照方式	(42)
二 家国同构的社会联系观 ——同类比附的批评方式的形成	(48)
第三节 心灵化批评的哲学渊源	(60)
一 《易经》中反映出的中国哲学渊源	(60)
二 万物感应的泛联系观	(64)
第四节 心灵化批评的创作学渊源	(73)

- 一 比兴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74)
- 二 楚辞中的寄托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78)
- 三 音乐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84)

第二章 心灵化批评的思维特征 (92)

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接受方式——体悟型思维 (93)

- 一 泛联系哲学观下的体悟型思维 (93)
- 二 体悟型思维的表现形态 (97)

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分析方式——系统型思维 (111)

- 一 系统型思维的网络式层次观 (111)
- 二 横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 (113)
- 三 纵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 (116)

第三节 心灵化批评的言说方式——比类型思维 (131)

- 一 比类型思维的特征 (131)
- 二 比类型话语的具体表现 (137)
- 三 比类型话语的优长与缺陷 (147)

第三章 心灵化批评的流变 (153)

第一节 发展期（先秦—两汉） (155)

- 一 泛联系的文学接受观 (155)
- 二 感应论下的文学接受者的主观读入 (165)
- 三 理性主义萌芽对主观意志读入的修正 (169)

第二节 成熟期（魏晋—隋唐） (177)

- 一 “言意之辨”与“象”的提出 (178)
- 二 人物品鉴与言语独断 (184)
- 三 “物—心志—物象”主体融入模式 (186)

四	“取境”思维与意象批评的成熟·····	(191)
第三节	凝定期(两宋—明清)·····	(198)
一	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	(198)
二	心学反叛与感性思维的回归·····	(202)
三	禅宗思维的抵抗·····	(205)
四	士大夫的边缘化与批评话语的心灵化·····	(209)
五	心灵化批评的凝定·····	(213)
第四节	批评主体的生存状态与私人话语的形成·····	(225)
一	士大夫生存状态的二重性·····	(228)
二	士大夫性格的二重性·····	(232)
三	集体话语的丧失·····	(242)
第四章	心灵化批评的运用·····	(252)
第一节	有意误读·····	(254)
一	有意误读的形成·····	(254)
二	有意误读的特征·····	(263)
第二节	比较定位·····	(272)
一	比较定位方法的特点·····	(272)
二	比较定位方法的运用·····	(277)
第三节	通感批评·····	(294)
一	“滋味说”的确立·····	(294)
二	其他通感式文学批评范畴·····	(303)
第四节	诗意的形式·····	(309)
一	批评文体的诗化·····	(310)
二	批评话语的诗意化·····	(317)
第五节	知音赏鉴·····	(331)
一	追求心灵契合的批评目的·····	(331)

4 / 心灵化批评

二 趣味性的文本解读…………… (335)

三 见仁见智的阅读体悟…………… (341)

结语 文学转型与心灵化批评的前途…………… (347)

一 市民感性的崛起与文学的边缘化…………… (349)

二 文学批评话语的民间取向与个性取向…………… (353)

三 心灵化批评是文学转型的硕果仅存…………… (357)

主要参考文献 …………… (364)

后记 …………… (374)

结 论

—

当时代的指针刚刚开始指向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陷入深刻的生存危机之中。痛定思痛之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同时积极引进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科学，并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启示下，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重直觉而轻逻辑，重整体而轻分析，重具体而轻抽象。而这一切，恰恰是与传统的经典物理学思维背道而驰的。中国科学和民族的最终落后，症结也似乎在此。因此，全盘西化的主张甚嚣尘上，中国传统的一切似乎都应在“革命”之列，孔家店被打倒了，经学被废了，文言遭到抛弃，甚至汉字也成为攻击的对象而被要求罗马化。可以说，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如此坚定和无情地否定过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

然而，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中国知识精英激情澎湃地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之时，一位西方的哲学家却对重视概念推演的西方传统思维提出了怀疑，他公然提出：“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像得来的，

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① 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克罗齐所划分的不应是知识的类型，而应是思维路径的两种方式，这种划分直接挑战的是西方几千年来唯我独尊的理性思维传统。

其实，不单是克罗齐，在与中国知识精英反思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一大批西方的思想家也开始反思他们的思维传统，从叔本华到尼采，从伯格森到弗洛伊德，都对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了批判。这股浪潮愈演愈烈，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困境，那些曾经“帮助我们创造了伟大艺术以及取得一切进步的理性标准名誉扫地”^②，甚至西方文化的终结问题也应该提到桌面上来了。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现代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直觉、无意识、联想、类比、象征、意识流等等被培根嘲笑为“偶然性”的东西的哲学价值，这种所谓的“非理性转向”恰与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理性转向”遥相呼应，共同应对着现代人类的精神危机。

其实，这种精神危机首先带来的是人类普遍的认识危机和哲学危机。朴素的东方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传统，无法抵抗科学主义培育出来的强大的技术力量和物质文明；同样，基于主客二分的西方理性传统，竟也无法解决现代人类的精神虚无。德里达试图求助汉字思维对西方文化进行解构，中国学者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一书中深刻探讨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并提出哲学上的否

① [意] 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3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英] 费夫尔《西方文化的终结》，第77页，丁万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